



京剧改革是“文化大革命”前文艺界中很重要的一件事，这场斗争是江青与北京市委的前哨战，也是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的原因之一。我的丈夫李琪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，参与了京剧改革，因在这项工作中与江青意见不合而得罪了江青。1966年5月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文章点了李琪的名。7月，他含冤而死。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他才真正得到平反。在这个过程中不少同志向我讲述了事实真相。几十年来，我作过一些调查。现将我的所见、所闻写出来，供研究历史的同志参考。

我所知道的京剧改革

○李 莉

—

江青在北京搞所谓的京剧改革调查研究，以京剧革命的“旗手”自居，把“女皇”的淫威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李琪就是在这种复杂微妙的情况下坚持工作的。原北京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路奇的记录，可以证明李琪在每次部务会上都要研究文艺工作和京剧改革。重要的报告及有关社论、报道都是李琪亲自动手写的。从与李琪一起工作过或有过文化工作接触的同志的回忆文章里，都能看出当时北京市委和李琪坚持正确方针，与江青展开针锋相对斗争的事实。

李琪多次强调，对待古老剧种的改革，必须保留剧种的特点。1964年1月，北京日报社举办了关于京剧改革的专题研讨。李琪提出了“两条矫正线，一个出发点”。“两条矫正线”是从右的方面反对“绝对分工论”，从左的方面反对“话剧加唱”。“一个出发点”：就是既是现代戏又是京剧。1964年10月，李琪在艺术工作负责人会上讲道：不要赶浪头，不要急躁，对戏曲、音乐一定要在原有基础上发展，脱离了原来基础就脱离了群众，失去了剧种的特点，就等于宣布这个剧种的取消，百花齐放也就不存在了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李琪的表态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。

江青对丰富的戏曲遗产采取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。江青说，她是同传统戏决裂了。江青还指责说：“北京市委有人对传统戏很感兴趣。”李琪不同意这种说法，他说：“这样历史传统戏就会绝迹于舞台。”百花凋谢，是一花独放的政策，是“左”的做法。李琪和邓拓一起主持召开昆、梆剧本创作会，会上提出，这几个古老剧种排演传统戏、新编历史戏和现代戏，三者不可偏废。

1963年12月14日，《北京日报》发表社论《让现代

戏之花盛开》。李琪特别让加上：“演现代戏光荣，演优秀的历史戏同样是光荣的……过去艺术实践证明，凡是经过认真推陈出新的传统剧目，或用新的观点来编写的优秀历史剧目，同样能很好为今天广大人民服务。”他宣传和坚持了“三并举”（传统戏、新编历史戏与现代戏并举）的方针。后来，李琪说江青看了这篇社论很不满意，认为是表面拥护京剧改革，实际上是反对京剧改革。

1964年8月，李琪在市委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指出：“我们主要应该演现代戏，历史戏也可以演一些，好的外国戏也可以演。有的同志讲要百分之百地演现代戏，我看不要把话说绝了，将来又会走向反面。历史戏不能完全不演，特别是京、昆、梆是长期演历史戏的，有些戏还是群众喜爱的。”

李琪还要市文化局提出100个历史戏的清单，并于1965年1月向中宣部报告，公演一些新编历史戏和传统戏。在当时的情况下，报告没有发出。3月，李琪还叫京剧团二队排演些历史戏。剧团领导不敢演，李琪指出，为什么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不敢演历史戏呢？在“五一”节招待国际友人的剧目中还是演出了几场历史戏，证明了李琪保护历史戏的决心。

北京市委很重视现代戏的编写和演出，一方面抓历史优秀传统戏，一方面抓现代戏。老舍编的《龙须沟》，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（简称“北京人艺”）演出，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。它反映了共产党爱人民，把臭气熏天、到处是污泥浊水的龙须沟一带治理成清水长流、清洁优美的地区，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。老舍和北京人艺及时地反映出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事迹，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

北京市委和市委书记彭真尊重作家和演员，对文艺工作常抓不懈地做了大量的工作。1963年12月，毛泽



1964年7月,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闭幕式上发表讲话。

东对文艺工作作了批示后,北京市委抓得更紧,及时对北京的文艺工作进行了全面总结,提出了改进和加强的措施。市委宣传部将其当作一项重要任务和中心工作,部务会议几乎每次都要研究,传达领导指示,商量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,改编历史传统优秀剧上演,要求作家深入创作,编写现代戏。为使有关领导和相关方面及时了解情况,出版了《文艺战线》,及时反映各种情况,及时传达领导批示。李琪对《文艺战线》很重视、很关心,亲自指导和审稿。文艺工作开展得更好,文艺工作者积极执行毛泽东给市委的批示,取得了很多成果。

然而,就在这时,江青打着对北京文艺演出进行调查研究的幌子,搞京剧改革来了。市委欢迎她来,文艺工作者也尊重她的指示。但她以特殊身份出现,不是来调查研究,而是指手画脚,挑剔刁难,使大家诚惶诚恐,不敢大胆工作。为了文艺工作的发展,大家尽力避开江青的阻碍,克服困难,各尽其职。江青否定17年来党的文艺工作的成果,把周扬等人都批成“黑线”人物,把文艺工作者都批为“黑干将”。

李琪说:江青不许别人提不同意见,哪怕是稍加说明,就会被说成是不听她的话、骄傲自大,如不说话就会被说成是有意反抗,多说几句就说你大逆不道,并怀恨在心,寻机大骂,还必须随叫随到,洗耳恭听。

二

李琪负责文艺工作,对剧本的创编、修改和排演,都要和同志们一起研究,所以看戏多。我也很喜欢戏,不论是现代戏还是传统戏,不分什么剧种,我都喜欢看。李琪从小就爱看戏,特别是参加京剧改革,又和江青联系,所以与江青对戏剧有不同看法,有时就跟我说说。我列举几出戏的演出,可以看看江青的态度。

《地下联络员》——是根据沪剧《芦荡火种》改编的,李琪说原本是江青推荐的,剧作家汪曾祺等改编。李琪根据彭真的意见,亲自领导实践,积极发挥文艺工作者的才智,集思广益,听取大家的意见,并要求既要有京剧的特色,又要具有现代戏的风貌。剧团领导萧甲又是这出戏的导演,大家呕心沥血,共同奋斗成功了。大家都很满意,可是江青不满意。她把萧甲等几位负责人找去,要他们把“茶馆”一场戏去掉。大家讨论几次,不同意去掉。茶馆里的三方对唱也是剧中重点的一场,唱、演都十分精彩,可以说是戏中之戏。萧甲说,掌握生死簿的人,救生才能生,引起众人大笑。经过大家努力争取,“茶馆”一场戏总算保留了下来。李琪和彭真都认为必须保留。周恩来后来也说保留得好。大家都学着唱,说明群众很喜爱这段唱。后来,毛泽东看了演出,肯定这出戏排演得好,并上台和演员合影留念。大家都十分高兴,毛泽东说剧名改为《沙家浜》更好。李琪说大家胜利了。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肯定,江青还可能要坚持去掉“茶馆”一场。这出戏在1964年全国汇演中,也得到大家的好评。成功的好戏最后却成了江青的“样板戏”,成了“旗手”的功劳。

这出戏排演后,李琪同意大家的意见,面向群众公开试演,目的是听取群众的意见。剧团开始登广告卖票,卖了三天票,票卖得很快,可是李琪在家忽然接到江青的电话:坚决取消公演。李琪气得脸煞白,两手发抖,坐下久久不开口。我问怎么了,他未回答,马上给剧团负责人打电话。他说:“江青同志坚决不许上演。改演别的戏,给群众解释,不愿看的可以退票。她原来同意可是又变了,只得照办,麻烦你们了。”他在说服剧团同志后,又对我说,江青搞突然袭击,给北京下马威,以炫耀她的权势,害得大家白忙了几天,真难为剧团同志们了,辛苦了几天卖票,还得辛苦地把票收回来,得费多少口舌,还会引起群众不满。群众不知原因,定要怪剧院多变。江青居高临下,说一不二,又反复无常。遇到这种人真没有办法。

《箭杆河边》——是北京作家刘厚明在顺义县根据一些素材创作的,反映农村的阶级斗争。江青看了说,正不压邪。李琪说:“不能把敌人写得都平庸,写出邪与恶,才能反衬出英雄、群众的高明。”

《矿山兄弟》——反映了门头沟京西煤矿的一个侧面,于是之、赵起扬写的。由北京人艺演出,参加了华北现代戏的汇演。当时正批“中间人物论”,有人提出《矿山兄弟》里的老二是“中间人物”,这对工人阶级来说不妥。这一提法正合江青的心思,要作为开展批判的对象,在汇演上引起争论。李琪说,有错是他的责任,剧本和演出他看过,认为是好戏。他对我说,彭真、万里也都



认为这戏好,有教育意义。报上大批特批“中间人物”,正常意见不能说话辩解,好戏也不敢多演,只许演完美无缺的英雄人物。事实上,先进、中间和落后是密切的、有机的联系,全面反映对大家教育更深。

《晴雯》——是反映《红楼梦》中宝玉的丫鬟晴雯的昆剧剧本,剧本由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创作。排演时,我随李琪看过,演得很好,演员充分表现了晴雯的特点,虽然唱词不大能听懂,但有字幕。演得成功,是剧本写得好。事后,李琪接受王昆仑的意见,写了一篇文章登在报刊上。李琪对我说,彭真关心地说:“好戏、好的文章也得注意,不要为此引起有些人的不满。”可能彭真已觉察出江青对北昆剧团的看法。果然,江青到北京搞剧改实验,提出取消北昆剧院,先是要改为昆剧队,李琪反映大家不同意。为了保留这个剧种,打算改为昆剧团。市委想方设法保留这个剧团,一直坚持到1966年初,在江青的压力下,不得不取消了。如今,昆剧院又恢复了。

《山村姐妹》——是反映昌平农村搞果树技术改革的话剧,剧作家刘厚明编写的,由北京人艺和农村文化工作队上演。排演中,李琪要我找来几位果树专家座谈。看了反映农村的戏,大家很高兴,也很重视,提了些建议。当时剧团的负责人和演员都重视我们的建议。排演后,参加了华北现代戏汇演,得到大家的好评。可是,江青却认为这出戏是演北京的,《矿山兄弟》也是演北京的,演北京的戏多了,后来竟成为北京市委的罪状。李琪说,彭真要求作家深入生活,去农村、厂矿企业,反映北京,却成了“大北京主义”,是“宣扬北京成就闹独立”的一种表现。李琪还说,北京是中国首都,宣扬北京

有什么不好,问题是看宣传的成就是不是事实,宣传的方向是不是对。

《杜鹃山》——是反映坚持井冈山斗争的戏。由北京京剧团演出。主角乌豆由裘盛戎扮演,女主角党代表由赵燕侠扮演。这出戏的排演和演出我都看过,演得好,剧情教育人,激励人。李琪说江青看了有意见,认为没有突出党代表,女主角唱词也少。她还说男主角用错人了,听说演员抽过大烟,这种人演主角有损英雄人物的形象。李琪认为,对从旧社会过来的名角,不能要求太苛刻,他们是名角,有演现代戏的要求,排练时很卖力,演出后反映很好。江青说不好,现代戏还必须是中青年演。李琪说,对于中青年演员的培养使用也得有个过程,北京很重视人才的培养,谭元寿、马长礼、李元春等,担子都很重。青年人也需要中、老年名演员带,这和干部的培养使用是一个道理。而演戏更是不同,唱念做打等等,都不是一日之功,得经过严格的训练。培养一个好演员比培养干部还难,只是性质不同罢了。后来,江青又组织汪曾祺、张艾丁等重新改编演出,也成了她的“样板戏”。

《红岩》——剧作家汪曾祺根据同名小说改编,由北京人艺演出。演得很好,演出了江姐的勇敢和机智。1964年要移植成京剧,要求演员到渣滓洞去体验生活。赵燕侠病了也得去。后来,她请假回来了,江青很不高兴。李琪知道后,通知赵燕侠先安心治病休息。江青知道后说:“连体验生活都经不起,哪还能演出好戏呢?对演员不能太迁就!”李琪说对人要讲人情,封建朝廷还不用病人呢。就是对身体好的人也不能用真的刑具考验,江青怎么不自己先去考验考验,坐着说话不腰痛,尽瞎来。原北京市委文艺处处长路奇说,当时李琪要求《文艺战线》反映赵燕侠的病情,才顶住了江青施加的压力。

《年年有余》、《雪花飘》——我们看了这两出京剧现代戏,觉得一些著名的老演员演得很好,群众爱看。李琪说:“群众对这两个小戏反应强烈,要求多演几场。是我们有意支持马连良、张君秋、裘盛戎等老演员演的。这批艺术家自编自演得多好呀。唉!江青禁止这些人出演,这难道不是要这些为群众所熟悉爱戴的名演员绝迹于舞台,剥夺这些老演员的艺术生命吗!我们就是要帮助他们演现代戏,他们有这个愿望这个能力来演。我还叫张君秋排《芦荡火种》。为什么男旦不能演旦,这不是我们共产党的规定,这是江青个人独出心裁、主观武断的坏主意。”1966年2月,李琪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:“市委意见



1964年7月,彭真观看宁夏京剧团演出的现代京剧《杜鹃山》后,与演员亲切握手。



是,这些老演员,除了在戏校教戏外,也还可演些他们能演的革命现代戏和允许演的老戏。”这也被说成是和江青唱对台戏。

《南方来信》——是评剧院根据反映越南反对美帝斗争的《南方来信》改编上演的,马泰主演。这出戏不仅中国人看了感动,越南人看了也说好。李琪说:揭露敌人的惨无人道,反映对敌斗争的书信,这不仅激励越南人民的对敌斗争,而且让中国人民也受到了教育,在这和平年代,人们应记住外来侵略者的残暴,人民对敌斗争的英勇牺牲的精神。话剧、评剧等剧种都演出才是我们及时改编的目的所在。可是江青看了却说是赶任务,粗制滥造,反映英雄人物的事迹不够。

《越海插旗》——李琪说,这又是一个好的现代京戏,导演、演员十分认真,也十分辛苦。他要求大家进一步向解放军学习,为超过《奇袭白虎团》而努力。据主演李元春回忆:李琪讲《奇袭白虎团》剧组很深入生活,你们也一定要去部队体验生活,在表演上要有很多创造性,要很好地向他们学习。在《越海插旗》中你们要创新,要有自己的独特性。在艺术上要超过《奇袭白虎团》,比如翻越铁丝网,不能超过两层吗?在大家的努力下,《越海插旗》在舞蹈、武打、设计上都有很大突破,演得很成功。国庆游行,该戏的彩车在天安门前接受毛泽东和中央领导检阅。李琪对我说,看到戏剧的彩车了吗?多好呀!这是演员们的汗水换来的光荣。叫那位江青也看看,北京是怎样重视现代戏的。说得容易做起来难,叫她来试试。她不是鼓励,而是一味地挑剔,哪像领导人。

《海瑞罢官》——这出戏的剧本是吴晗写的,由北京京剧团演出,演海瑞的是马连良。这个轰动一时的好戏,后来竟成了批判的重点。毛泽东在困难年代说大家要敢提意见,要大家向海瑞学习。吴晗是奉命而写。可是后来变了,说是嘉靖罢了海瑞的官,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,并讲批海瑞的文章,只有北京和我那个省未转载,后来印成小册子但卖的不多。我记得彭真向毛泽东汇报:经查证,吴晗和彭德怀没有什么关系。这也得批。李琪、范瑾和邓拓都认为上海方面批北京市副市长,和北京市委连个招呼都不打,太不妥当了。范瑾打电话问上海方面是什么意思,上海方面不讲,还让买批判吴晗的小册子,大家想不通。李琪在市委召开的宣传出版小组会上,一再强调吴晗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左派,反右时也不是右派。他亲自到报社讲批判要从学术观点理论出发。这也是彭真和大家的意见。

三

北京市委还开展了各条战线的文艺活动。开展群众性的文艺活动,也是十分重要的任务。自编自演节目,为文艺战线增加了活力,形成了业余的文艺力量。彭真提出要发动作家和群众写北京、演北京。专业作家和业余作者都很活跃。1964年,市总工会组织业余汇演,我们林业战线也参加了。市文化局曾派人到林业文

艺班进行培训。王纯、李琪、赵凡、赵鼎新、路奇等人到市委党校看工人们演出,并接见、鼓励大家。李琪说,业余文化队有力量,同志们有生活的实践,又有人才,一定要重视。这对各系统各单位业余文化活动的开展是很好的推动。江青看不起业余演出,不仅认为分散精力,还把“写北京、演北京”列为北京市委的罪状。

北京市委在京剧改革中做了大量的工作,对文艺工作作出很大贡献。北京的剧团演出了很多现代戏,京剧、话剧、曲剧等都有。剧团积极认真地工作。可是江青还不满意。这位“旗手”把成绩归于自己,“样板戏”就是她的资本;把所谓的错误、不足都说成别人的,动辄给别人扣上“破坏戏剧改革”的罪名。

1964年,市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,多创作、多演戏、多拍好电影,改编各剧种,创作、演出京剧《地下联络员》、《箭杆河边》,评剧《向阳商店》、《夺印》、《祝你健康》、《李双双》,曲剧《雷锋》,话剧《山村姐妹》、《槐村庄》、《霓虹灯下的哨兵》,电影《青春之歌》、《红旗谱》、《风暴》等等,以及经得起考验的优秀传统剧目,市委要求一定要抓紧时间排练和上演,这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任务,也是人民所喜爱的。

李琪从小爱看书,又爱读古书,爱看戏。他对我说,他的不少知识是从戏中得到的。凡是外地来京演出的戏,他挤时间也要去看。特别是对家乡戏蒲剧一场不漏,对传统改编戏更是爱看,如对《薛刚反朝》、《柜中缘》等连看几场。他对地方剧团也很关心,每次都到他们的住处去看望。有一次,我同他去剧团,他看到名演员如阎逢春、王香兰几个人住的、吃的、穿的都很简朴,建议提高他们的待遇,使他们能住好、吃好、穿好,要像演戏一样有气派。他还为剧团题词,可惜他的手稿和送的题诗都在“文革”中被毁掉了。他爱戏,买了许多戏的唱片,有时间打开唱机,把唱词给我看,他跟着唱。他喜欢的剧种有蒲剧、京剧、秦腔、晋剧。

1965年7月,李琪带队参加华北局在太原市召开的京剧革命现代戏观摩演出后,十分高兴。京剧演员李元春说:北京参加的剧目有《南方来信》等四个。北京又组织了名演员顾问团,马连良、张君秋、裘盛戎、马富禄等都参加了。李琪对大家关心备至,连吃饭都要他们吃得如意,组织大家认真观摩、座谈,对现代戏汇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李琪曾跟我说:这次名演员和大家都很积极地参加活动,表演也很认真,又一次证明北京京剧团是在出色地搞京剧改革,而且成效很大,得到会议的赞扬。

一些到会的领导人都知道这些名家,又爱看历史剧,想看名演员演的历史剧。李琪解释说,这次不能演历史戏,如有人反映了,让江青知道了,还能放过?!她可以说成演现代戏是假,演历史戏是真,并以此为把柄整人。大家听了觉得有理,因此未演历史戏,只是小范围组织了两次清唱。大家更认为传统优秀历史戏不能禁演。正如池必卿所写,接受李琪的意见避免了一场风波。■